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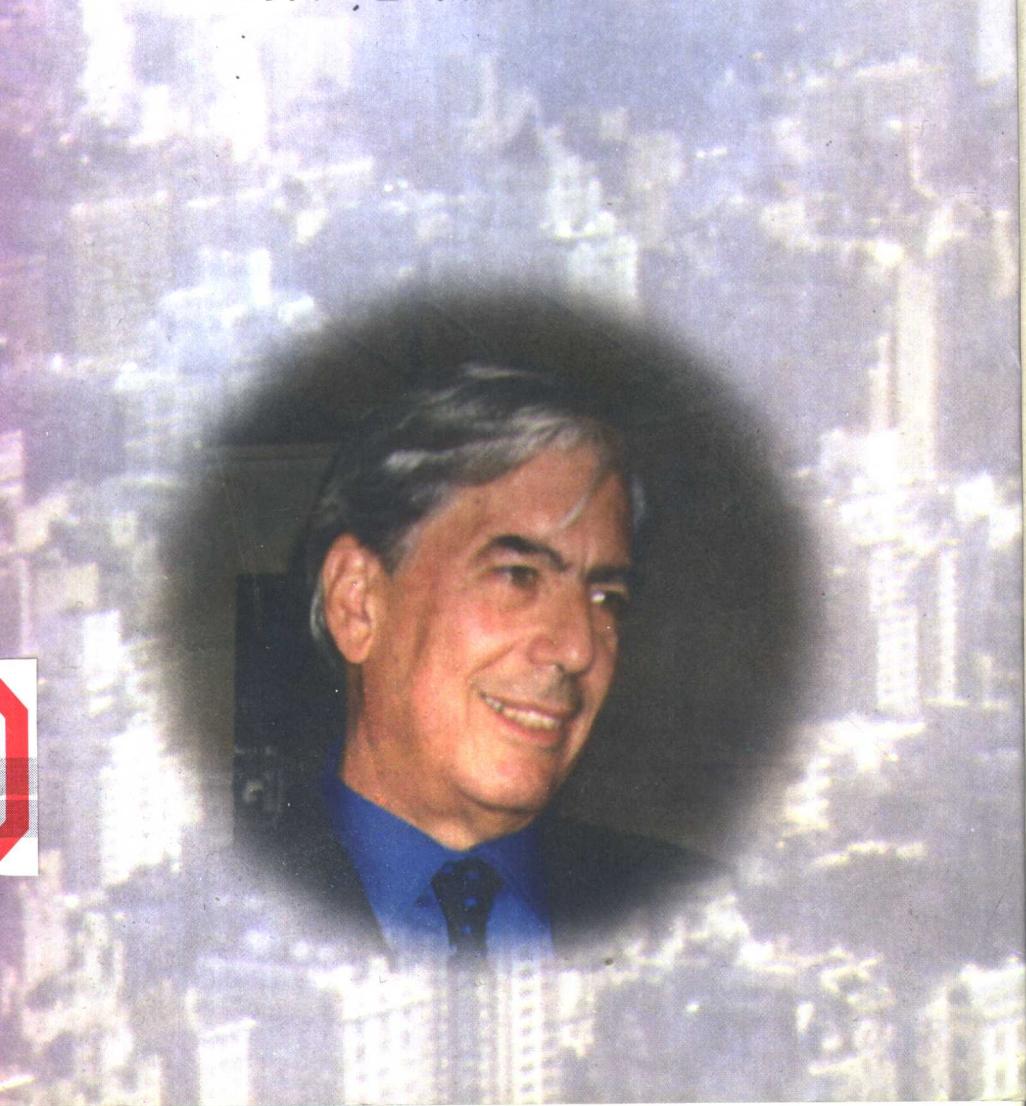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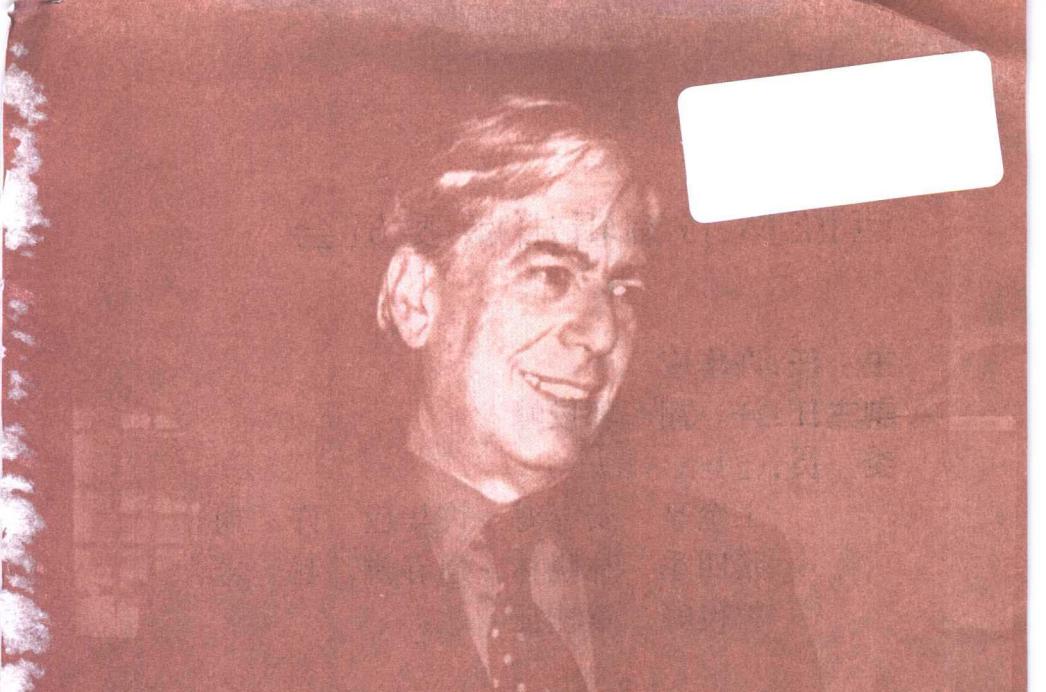
巨匠丛书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

水中鱼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

主编/赵德明

水 中 鱼

赵德明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 版权登字 07—1996—82 号

“巨匠丛书”第三部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之九

水 中 鱼

SHUI ZHONG YU

中文版权所有©—1996.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版权由西班牙卡门·巴塞斯版权公司通过译者授予

水 中 鱼

EL PEZ EN EL AGUA

作 者：〔秘鲁—西班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译 者：赵德明

责任编辑：安春海

版式设计：安 然

封面设计：章桂征

责任校对：王文季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398 千

印张：17

印数：5000 册

版次：1996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金城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5387-1020-5/I · 977

定价：25.00 元

巨匠丛书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许华应

副主任:许 翔 郭俊峰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金亭 安春海 许华应 许 翔

张四季 林晓林 逢春耕 赵 岩

郭俊峰 章桂征

策划:安春海

目 录

译者序.....	(1)
第一章 是我爸爸的那位先生.....	(17)
第二章 圣马丁广场.....	(43)
第三章 利马, 可怕的城市	(62)
第四章 民主阵线.....	(85)
第五章 幸运的军校学员.....	(106)
第六章 宗教、市府选举与摇臀舞	(130)
第七章 新闻学与放荡的生活.....	(148)
第八章 自由运动组织.....	(165)
第九章 鲁乔舅舅.....	(191)
第十章 公生活.....	(217)
第十一章 阿尔贝托同志.....	(240)
第十二章 阴谋家与四小龙.....	(267)
第十三章 勇敢的小萨特.....	(282)
第十四章 廉价的知识分子.....	(315)
第十五章 胡利娅姨妈.....	(331)
第十六章 巨变.....	(360)
第十七章 波斯鸟	(389)
第十八章 肮脏的战争.....	(416)
第十九章 巴黎之行.....	(460)
第二十章 句号.....	(480)
补 遗.....	(533)

译 者 序

(一)

1994年7月12日(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大儿子的生日,二是那天下着瓢泼大雨我却不得不进城),在北京王府饭店见到了秘鲁—西班牙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及其全家。会面中除谈及来华访问的经过、目的和印象之外,主要是谈文学,其中就说到了《水中鱼》的翻译问题。译者拿出原书请教作者几个问题,略萨不仅一一做了详细回答,还改正了几个印刷错误,一面说明准备从头修改一遍。为便于今后联系,略萨就在原书的封底上写下了住址、电话和电传。为了保证号码的准确性,他还让站在一旁的小女儿跑回楼上卧房请夫人核对一遍。

1995年初,《世界文学》的副主编许译先生表示愿意首先在刊物上发表五章。于是当年的第二期上便有了《水中鱼》的第二、四、六、八、十各章,但这时我已到了西班牙工作。4月,时代文艺出版社的安春海同志与我取得了联系,希望出版《水中鱼》全书,并要译者向有关机构了解版权事宜。译者随后给在伦敦居住的略萨写信谈及此事。一个多月后回信来了,但不是略萨写的,而是他的秘书,称:作家在美国讲学,但他会与

你直接联系的。一星期后，略萨打来电话，说此事可与其出版代理人卡门女士接洽。8月，译者专程去巴塞罗那打探消息。女老板不在。女秘书接待，对要求做了详细纪录，并主动把《水中鱼》的最新修定稿复印出来送给译者作为翻译的根据。10月18日译者参加了西班牙穆尔希亚大学主办的略萨作品研讨会，与略萨第二次会晤。我当即提出版权问题。略萨答应当晚与卡门女士联系。次日，作者与译者共进早餐。略萨说，版权问题已经解决，卡门女士会发出授权证书的。11月初，安春海先生来电催促。译者当即与卡门联系。女秘书称老板不在西班牙，11月6日可回巴塞罗那。11月12日女秘书寄给译者一封信，希望时代文艺出版社重申出版略萨中译本的条件。安春海先生当即做复：每部作品付版税300美元，初版印刷5000册，版权期10年。12月，卡门版权公司保持沉默。1996年元月，经译者再三催促，卡门的女秘书电复：老板准备全面答复此事。2月初，正式复信寄到，内称：可给时代文艺出版社一个优惠价：10万美金，为期5年，可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对欧美出版公司来说，这个价钱不算高，但对时代文艺出版社却是不可能接受的。谈判陷入僵局。3月底，译者完成在西班牙的教学任务，准备取道巴塞罗那做最后一次努力：陈述中国目前图书市场状况和出版社的困境，争取把版税降到1万美金!! 4月2日，终于与卡门女士面谈。不料，对方一开口就表示：本公司不打算把版权卖给任何一家中国出版社，因为贵国的出版业尚未进入国际法规的正常状态。译者愕然，当即反驳说，中国已正式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尊重知识产权，这一年来与贵公司的谈判就足以说明我们对版权的认真态度，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出版社购买版权的财力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如贵公司要价过高，就会阻挠文学作品的传播，这与贵公司扶植、支持

和推动文化交流的宗旨是相背的。卡门女士：“您这是从道义上向我发难。”译者：“这是实情。您要价过高，中国的出版社支付不起，客观上就阻挠和障碍了外国文学在我国的流布，这难道是您愿意看到的情景？”卡门：“我们宁肯等一等再说，因为我们也要保护作者的权益，现在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报价实在太低了。”译者：“您当然应该保护作者的权益，但是像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样世界级的大作家，如果不被中国的广大读者所了解，他还具备全球范围的知名度吗？我认为在巴尔加斯·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应该让他的作品与中国读者见面，而不是等待。何况中国人使用的是方块字，要一笔一划地去写呀！”大概是方块字打动了这位大老板，她请译者用汉语写出“水中鱼”三字。看罢，沉思良久，她说：“看来与中国译者比较容易沟通，我们愿意与您合作，把翻译和出版权让给您，请您及时把出版情况告诉我们，如何？”4月3日，双方在合同上签了字。《水中鱼》的版权就是这样争取来的！

(二)

自1980年开始至今，巴尔加斯·略萨已有以下作品被译成中文：《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潘上尉与劳军女郎》、《世界末日之战》、《狂人玛依塔》、《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谁是杀人犯》、《谎言中的真实》和《水中鱼》；占全部创作的二分之一。

《水中鱼》是1993年的新作，同年4月出版。友人尹承东先生托人购得，为支持译者翻译此书便割爱相赠了。初读此书，只感觉作者回忆文学生涯的部分极有参考价值，对于他从1987—1990年涉足秘鲁政治之事颇不以为然，甚至1995年10

月18日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时还强调：“如果略萨在1990年大选中果真当了总统，他也未必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但是世界上却少了一个优秀的作家。”话音刚落，会场上爆发出一阵表示赞同的掌声，但是，译完全书之后，我却反问自己，马克斯·韦伯说了：凡搞政治的都必不可免地要与魔鬼签约。那么如果签约的人都是流氓、无赖加政客，那政治生活岂不更污秽？反之，签约的人多一些智者，是否可用权让鬼推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呢？历史固然有其不可预测、难以捉摸的一面和令人吃惊的曲折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难道就没有“事在人为”的另一面了吗？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是有的。否则哪里来的清官、清明政治、变法、变革和改革呢？

《水中鱼》单数各章回忆了作者是怎样踏上文学之路的；双数各章描写了作者1987—1990年的政治历险：从反银行国有化开始，到组织民主阵线，到参加总统竞选，到失败的出走和回归文学之路。两条叙述脉络均以事实为基础、以时间为座标，中间夹杂着一些议论，但绝对构成不了什么理论体系。可是译完全书后，译者感觉这些事实要比那些所谓的理论更有说服力。仅以《水中鱼》这个书名为例，“水”就是社会生活，“鱼”就是作家，就是文学创作；“水”又可以是政治舞台，“鱼”是各式各样的政治家；“水”还可以是秘鲁的客观现实，“鱼”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篇幅而论，“水”的部分，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秘鲁的历史与现实、党派斗争、竞选内幕等，写得详尽、生动，约占三分之二的份量，而作者的主观努力、理想和追求则居次要地位。这样的安排与作者是个不可知论者有一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他的不可知论的感慨是在大量的社会调查与实践之后发出的，这对于读者认识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有帮助的，尤其是中国读者。因为我们接受的“人定胜天”、“鱼

跃龙门”、“亩产可以25万斤”的思想教育实在太多了。不可知论会导致宿命论从而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但凡行事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则导致唯心论和自大狂，办事易狂热、冒险、“大跃进”及至摧毁一切文化的“文革”。《水中鱼》绝对不是哲学书，但我们可以从中领悟的哲理却远远超过了“如鱼得水”的程度。

(三)

谈几个具体问题：

1. 80年代的秘鲁是一盆什么“水”？

按照巴尔加斯·略萨的认识，这是一盆“浑水”：

经济危机、暴力和官场腐败是80年代到90年代秘鲁的主要问题。

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通货膨胀、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增加、生产持续下降，从而导致工人、农业工人生活的进一步贫困化；导致中产阶级的萎缩与分裂。

暴力既有极左思想的影响，如游击中心主义的作祟，也有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等客观条件的激化，活动范围大，行为残暴者首推“光辉道路”。

官场腐败既是造成“浑水”的原因之一，又是“浑水”里的鲨鱼或是拉美亚马逊地区的食人鱼。

2. 巴尔加斯·略萨治理“浑水”的处方：

私有制、法制加自由化。

巴尔加斯·略萨主张全民都搞私有制，他认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中，个人利益是基石。法律首先要保护个人合法利益，尤其要扶植和鼓励个人创造性的劳动，为公平竟

争确定法律保障。企业要私有化，商业要自由化，经济要多元化。大力引进外资，面向世界开放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大力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文化教育，提倡私人办学。

略萨主张宪法高于一切，任何政党都必须服从宪法；绝不允许搞一党专政，尤其反对独裁者凌驾国家之上。建立健全民主选举制，新闻自由，鼓励舆论界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

提倡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反对种族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大力培养公民的爱国意识、环保意识和人类意识。

为实现全方位的自由化，他给自己发起、成立的组织命名为：自由运动组织。

3. 略萨的“处方”为什么不被多数百姓接受？

1990年6月10日，略萨第二轮总统大选失败，百分之五十七的选民不接受略萨的执政纲领，尤其是下层百姓。略萨对此迷惑不解，但他把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如何准确估计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性？换句话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年龄，不同年龄有不同年龄的特点并决定其行为，一个国家也有自己的年龄：秘鲁今年多大岁数？计算这个年龄是有标准的：历史是个基数，更主要的是看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文化教育、科技发展水平，广大人民衣、食、住、行的物质水平，文化艺术修养、道德修养、公民意识、法制意识的精神水平，法制规范的程度。而秘鲁的现实情况是：生产力低下（印第安人还在刀耕火种，其人口占全国5%），文盲多（2000万人口中，一半以上是文盲、半文盲），封建、落后、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独裁统治和长官意志很有市场（广大群众采取容忍态度），可以说，正在从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后期向以工业为主的前工业社会过渡。《水中鱼》所表现的正是这一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综合病症。略萨长期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1958年即定居在欧洲，他对秘鲁下层百姓

的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从零开始。”“处方”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照抄西方后工业社会模式的产物。把治中老年疾病的药方用到青春少年身上焉能不错？！

4. “精神贵族”的可贵与悲哀

真正的“精神贵族”乃指知识、文化、智慧上的富有者，他们的劳动是思想、精神上创造性的劳动，不是“掉书袋”。其劳动成果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或有所发现或有所发明或有创造，从而走在同代人认识水平的前头。他的创见来源于社会生活，但一经他的发现、发明和创造，其见地便高出常人许多，故具有超前性，因而一般人对他创见的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在一段时间里，他不被人理解，常常有“孤独”之感；而一旦人们普遍接受了他的思想时，又易为名利所困扰、所累赘，甚至从此失去认识社会的灵性、敏感与锋芒。当然还有更惨烈的情况，发现真理以后在传播的过程中被反动、保守的势力所杀害，总之逃不出古人所说的“先知者常刑”。这实在是大智慧者的悲哀。

巴尔加斯·略萨是个文学才子，不是政治家。隔行如隔山，搞政治得会玩权术，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会搞阴谋诡计，会搞蛊惑宣传，有智慧、有道德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是不应涉足其间的。这是墨西哥大学问家帕斯的忠告。略萨难耐寂寞（还是修炼的火候不够）和权力的诱惑与魔鬼签了协议，结果选举大败，把改革的韬略拱手送给政敌之后悄然去国出走。值得玩味的是，这时他反而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可见骨子里还是要追求精神思想自由的。而这样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是有限的和相对的，仅以译者目前所在的西班牙而论，就有这样一堆问题威胁着人们的自由：经济危机、失业、恐怖活动、环境污染、毒品走私、移民潮高涨、爱滋病蔓延、长达6年的大

旱、官场腐败成风，等等；在1995年11月27日召开的欧洲环地中海国家外长会议上，西班牙国王大声疾呼：和平、稳定、繁荣！世纪末的现实是严酷的，所以人们才总是对未来抱有幻想，而文学艺术恰恰是建构这一幻想的沃土。西班牙画家曼努埃尔·戈麦斯对我说：“我的这些风景画是现实生活里找不到的。”译者听了很不以为然，劝他去看看中国的漓江、杭州、九寨沟、黄山……，并强调说，自然之美是不可替代的、无以伦比的，是文学家、艺术家创造的源泉。曼努埃尔回答说，这当然是对的，但你没有说出来我们脑海里想象出来的艺术世界为什么更迷人、更自由、更无边无际、更变化多端？因为我们这个想象出来的艺术世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它不仅能找回失去的过去，还能弥补和创造今天与明天。而现实世界是相对的、受局限的。至于社会现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世纪末的地球是个垃圾堆。

这种论调当然是太悲观了，地球上还有它美好的一面，何况还有可以化“垃圾”为神奇的艺术家呢？实际上，文学家、艺术家总是要不断地往返于客观现实与主观想象之间的。巴尔加斯·略萨的《水中鱼》就证明了这一点。作家是社会的一员，只要他是有良知的，就不会对社会的丑恶无动于衷，他总会站出来批评丑恶和清除丑恶，就是创造美和善，也不可能不针对现实的丑恶。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文学、艺术是主观想象的产物，幻想和虚构是它的主要特点，是作家、艺术家主观情绪、情感、思想的结果，它虽然与现实有联系，但常常不是现实直接反映、反射出来的影子，而必须经过作家、艺术家的想象，在想象的过程中，有时联想到现实的美好而夸张、延伸、发展之，有时则联想到其丑恶而批判、否定或用美好而取代之，总之具有极强的主观色彩，从而构成另

一个世界：艺术世界。巴尔加斯·略萨是属于这个艺术世界的，因为他具有很强的艺术觉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他的强项，而搞政治，需要务实、铁腕、谋略和冷酷。略萨在这方面没有优势，只有劣势，他在回归文坛时有“解脱”感，说明他的家在文学园地，政治不要他，文学世界需要他，他更需要文学。

(四)

1990年6月秘鲁大选之后，略萨的获票率仅达百分之二十三。他带着妻子回到了伦敦寓所。这一年，意大利授予他西西里文学奖；美国迈阿密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聘他为荣誉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分别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1993年，西班牙给他的长篇小说《利图马在安第斯山上》授以环球文学奖。1994年3月24日，他当选为西班牙语言皇家学院院士。1995年4月23日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手中领取了西语世界文学的最高奖赏：塞万提斯文学奖。同年10月20日出席略萨作品国际研讨会，22日被穆尔西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11月24日在西班牙乌尔瓦市担任第二十一届西班牙语世界电影节主席。

从上述活动中可以看出，略萨一回到文学天地里来便“如鱼得水”了。1995年4月22日，他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那时（指1987年反阿兰·加西亚政府的银行国有化运动）很幼稚，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我并没有一个明确、清醒、现实的看法。这次经验使我明白了，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做的、不该做的，即使做了也是没有意义的。”“今后我是不会

搞政治的，权衡利弊之后是不值得干的。”“因为作家有他的基本位置。”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涉及 20 世纪拉丁美洲作家继承的一个传统：19 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爆发了以土生白人为领导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在这些土生白人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其中文学家居多。在独立运动爆发前夕，许多作家以文学为武器从事宣传工作，当时流行的口号是“祖国的独立是诗人灵感的唯一源泉”。按照略萨的话说，“你既然是个作家，那必须就道德、宗教、政治问题拿出主意来”，“文学不是一种纯粹的娱乐，它与生活有关，与各种社会问题有关，因此优秀文学必须帮助人们生活。”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的今天，并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批评社会、介入社会成为当代拉美文学的重要特征。略萨说：“文学干预政治是件好事，它可以净化政治，免得被政客独家垄断。换一个角度说，文学被政治污染也是好事，免得文学成为单一的智力游戏。”但是，文学是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方面，在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法律、艺术中，它只占一席之地。它不仅与政治有关系，而且也与哲学、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等有密切关系。19 世纪的拉美文学曾经担负着哲理说教、弘扬信仰、德育和美育等功能，进入 20 世纪以后，文学与其他文化门类的分工越来越明确，它自己的位置和活动范围便渐渐明朗和固定起来，尤其是电影、电视的发展，使得文学的天地更趋狭小，功能趋向单一，但是，文学的个性同时也变得鲜明起来。其中尤以想象和虚构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此，略萨感触很深，1995 年 4 月 25 日他在接受塞万提斯文学奖时说道：“有了文字以后，虚构踏入书籍之门，将此前一直是经口述才能领悟的想象天地固定下来。文学从此定居并使得挤在虚构中的神话和典型人物永存：通过以神秘方式

的虚构，一种创造出来填平现实与愿望之间鸿沟的生活（人类总是摇摆在这鸿沟的两端），便获得了合法公民的权利；因而想象中的幽灵便加入到生活中来，用巴尔扎克的话说，便成为民族的隐私史。”

那么虚构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略萨回答说：“虚构小说当然要有娱乐性，否则就算不上小说了；但是娱乐性在其次或更其次的位子上。一部虚构小说首先是针对现实生活的造反行动，其次是给由于生活在命运的监牢里而感到焦躁的人以补偿，因为‘不可能的东西造成的诱惑’会使命运之牢里的囚犯感到激怒。按照拉马丁的说法，这种‘诱惑’使雨果创作出《悲惨世界》，因为人们总想走出现时的生活，总想体验比他们经历过的更丰富或更贫困、更纯洁或更可怕的生活。”接着，略萨以《堂吉诃德》的创作为例，进一步对虚构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他说：“虚构小说是对世界现状的亵渎；是对现实不妥协的见证与源泉；虚构小说无可辩驳地证明：真正的现实和我们经历过的生命，与我们的现状而不是我们希望的现状相比，仅仅是一小部分，因此我们要创造新现实、新生活、虚构的生活。这种生活由于高于现实之上，特别是虚构得非常出色时，比如像《堂吉诃德》那样，就不是社会繁荣、昌盛的征兆了，而恰恰是它的反面。一部伟大作品的出现总是表明这是一次充满勇气的造反行动，它构成一个想象世界的外观，在保留现实世界面孔的同时，实际上是排斥现实并质问现实的。大概这可以解释塞万提斯的毅力，他似乎是以顽强的意志在忍受着恶劣的环境：他以象征性的弑神之罪去报复环境，他从失望中汲取力量，编造出一个新的现实，用其光芒照亮虐待他的现实和反抗那个现实。”

接着，略萨把堂吉诃德和桑丘进行了比较，他说：“事实上

堂吉诃德对现实世界的排斥，如毁坏财物、解救罪犯、攻击羊群、毒打可怜的村民，只有读者觉得亲切，而不会是书中的百姓；作者把书中这些人都施加了魔法并且不时地用长矛刺他们一下。假如桑丘的实用主义占据上风，即他对这个世界各种事物的全面理解占据上风，那么全书结束时堂吉诃德身上的伤口或许少些，口中的牙齿或许多些，但是这部小说也就不存在了——或者无聊之极，形同嚼蜡，西班牙语及其文学也就不会像今天这般丰富多彩了。因此，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我们赞赏堂吉诃德不是把他看做一个实在的人，而是一个幽灵、一个虚构人物；而使我们远离桑丘的是，他就在我们身旁，不像小说人物，更像活生生的人。以此，我推出第二层意思：虚构小说存在的理由不是反映现实，而是否定现实，将现实变为非现实。就是说，当小说家像塞万提斯那样掌握了语言的魔术技巧时，他表现出来的似乎是真正的现实，而其真相恰恰是现实的反命题。”

上述看法给我们的启发是：人类的生命特征之一在于思想，其中幻想常常是创造的动力之一，幻想的基础是客观存在，而追求的目标是现实中“无有”的。略萨说：“科学、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要归功于这样的幻想家。没有他们，欧洲人就不会发现美洲，中国人就不会发明印刷术，当代人就不会有人权，可能我们为了给庄稼求雨还在地上干跺脚呢。”

问题是，人类的幻想无边无际，而幻想变成现实的可能少而又少，生命只有一次，生命中的欲望何止千万次；幻想和化幻想为现实的可能性难以成比例。现实生活中的有限性（时间、空间、环境的限制）和不可重复性与幻想世界的无限性和重复性，使得人类永远生活在两难境地：永远不满现实而永远抱有幻想。小说的诞生仅仅是为了部分地实现那幻想的世界，画饼充饥以